

ZHONGGUO

中国

FUXING

复兴之路

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回顾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21世纪经济报道》编著

ZHILU



中国 复兴之路

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1世纪经济报道》编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复兴之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1 世纪经济报道》编著.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391-8962-8

I . ①中… II . ①2… III . ①小康建设—中国—文集
IV . ① F1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0338 号

中国复兴之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1 世纪经济报道》编著

选题策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宇

特约编辑 华超超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80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8962-8

定 价 30.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3—49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序

我们的“心灵习惯”

《21 世纪经济报道》主编 刘 晖

很多话之所以说了又说，是因为问题没有消失。对于那些念兹在兹的问题，用“喊破嗓子”也许并不过分，当然其目的是为了“甩开膀子”。

这本书的素材来自于《21 世纪经济报道》一些重要专题。时至今日，书中所关心的问题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感。比如说，当下正在进行的简政放权，是希望能够释放更多的市场活力；比如说去过剩产能，也为了改变结构“错配”的问题；而对流动性进入管理，也是因为货币超发的大背景在。当空转的货币游戏盛极一时，实体经济的振兴从何说起。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经济的连续增长，培养了不少凯恩斯的信徒，但是要经济转型，多听听哈耶克的声音，也不是件坏事。

本书的副题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故事应该在广阔的历史光谱中展开，而作为个体的公民更应该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下，对于中国这个后发的现代追赶型国家来说，百年近代史带来的，不仅是主权国家的分崩离析，也是帝国治理体系的完全崩溃，更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刻焦虑。可以说，在百年来，我们“心灵的习惯”一直被诸多复杂的情绪所包围：挫败（我们本来应该是强大的）、怀疑（我们是谁，又能成为谁）、怨恨（到底是谁造成了这种状况）、焦虑（我们到底应该往何处去）。

而选择市场经济的道路，也是经过多次试错后的结果。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无论是从总体的控制，还是依附性人格的消解，都是一服清凉的解读剂。计划经济对一个“超级大

脑”的设计，将会导致对一个具有绝对权威性质的“老大哥”的产生，而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却是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地基，也只有保证了契约和权利的运行，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才是可能的。

从更长程的历史观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制度和观念的发酵和深入：像“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权利意识，像“政府应该有限但是应该有效”的法治意识。这些带有常识意义的基本意识的萌生和成长，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而且会在市场过程深化中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在这种演进过程中，既有缓慢渐进之时，也有突变疾飞之际。就像岩石中的气泡，在那些看似窒息的空间里，也会变成水滴，而水滴又会形成河流，汇入大海，而大海将拥抱所有的河流。

对于有尊严和正义的生活，人们总是心向往之。道不孤，必有邻。美好生活的根基来源于对常识的确认。我们“心灵的习惯”应该这样构成：自信（我们能够国富民强，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努力去选择幸福的生活）、自觉（我们有能力吸纳全球的文明，并对自身的传统和文化有充分的认同）、尊严（我们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幸福（这是我们的祖国而不是异乡，在这里，我们能够安身立命）。

而这些正是所有宏大命题的出发点。

目 录

序	1
---------	---

1 追寻现代中国

回望新中国	1
建国 60 年的中国经验，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	
——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	5
“强国共识”下的经济崛起	15
外交 60 年：入世与创世	20
“西方”在哪里：向世界学习之路	23
海外华人的“中国认同”故事	27
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	
——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前 驻法大使吴建民	31

2 发现真实中国

我们应该怎样去相信未来	36
破除“中国模式”迷思	39
追问行政主导模式的持续力	46
考量“十二五”：未来棋局的“落子”设想	54
资本大国“进化”录	59

3 重回改革现场

西柏坡上几代人：每天都是赶考的日子	66
另类变革路：南街村的“二十四节气”	73
哈尔滨：一个工业先行者的追赶历程	80
56个民族在一起：那些西南民大人.....	84
太湖大学堂：风声雨声读书声.....	88
“全球化实验室”一瞥：前门的时光隧道	95

4 社会的转型

松花江治污十年螺旋	100
走出三鹿废墟：一个公共品体系的艰难重建	104
追问上海社保案：大上海的转型轨迹	109
新北川启示录：生活方式如何革新	114
三峡与万州：带着体温的移民史.....	119
寻找太空驿站：中国登月三个时间表	125

5 重建中国社会

公民胡小燕	129
工资单的秘密	134
“钉子户”列传	138
国家转型试验：还要不要温岭	143
“善”者俞可平	147
协商对话是解决治理难题的“第三种机制” ——访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	153

6 改革在深化

多干实事，少说空话.....	157
“强势政府”逐渐淡去，“市场先生”来到上海.....	160
给社会组织松绑和放权.....	164
敢为医改开药方？.....	168
教改“旗手”.....	174
《社保法》背后的智囊们.....	178
土地确权颁证的那些事儿.....	187

7 可见的未来

改革需要一个路线图

——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	193
----------------------	-----

落实新 36 条，打破发展的制度障碍

——专访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	198
-------------------------	-----

未来中国结构转型“新红利”.....	201
--------------------	-----

收入分配改革：应保证居民收入与 GDP 同步增长

——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205
---------------------------	-----

改善民生，经济才有内在动力

——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	209
----------------------	-----

社保基金缩水须完善投资管理体制

——访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214
----------------------------------	-----

8 前行的路径

中国崛起的经济、政治与文化

——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	219
-------------------------	-----

善治，通往幸福之路	225
大国外交应持主动的建构性思维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229
科学发展 PK 加快发展.....	234
从历史上看稳定与久安之道	238
共同富裕与国民幸福	242

9 展望未来中国

国有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248
中国经济发展布局由陆地向海洋延伸	
——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司司长范恒山.....	252
城乡统筹：方向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	260
再过 10 年，西部大开发将出成效	
——访原国务院西部办副主任曹玉书.....	263
就业应该从过去抓数量变为抓质量	
——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张车伟	267
财税改革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可做、应做之事	
——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270

1 追寻现代中国

回望新中国

30年河东，30年河西。60年岁月轮换，共和国华诞将至。从民族国家的奠基，到国家建设的掘进，其间关山重重，道阻且长，既有在变革岔路口的屡仆屡起，也有穿越“历史三峡”的风高浪急，而追寻现代中国的梦想，虽九死其犹未悔。

6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正所谓那稍纵即逝的玫瑰未必逊于万古长存的山岭。拉长历史的视线，把60年的历史放在近代的百年史，乃至千年史的光谱中，在时间的结晶体中，会呈现出多义互现的重叠认识：无论是从千年未有之变局看中国转型的历史维度，还是从世界大历史框架下观察中国道路的时代价值，抑或从文明的角度来挖掘一个古老国家的浴火重生，那些纹理纷呈的历史切片都值得去观照。

从帝国到共和国，一代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用血肉撞击沉重的闸门，从开除“球籍”的焦虑到重新崛起的自信，结束了近代史上100多年的耻辱和失败。任何国家都难以用眼角的余光来打量中国，而必须正视这个不断变化和生长的中国故事。而作为后发现代化追赶型国家，中国道路所包含的元素与特质，超越了以往的线性发展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世界现代化转型理论展示了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样本。对于观察家来说，不仅要在中国发现历史，更要在中国挖掘历史的谜底：这个未完成的史诗，将如何改变中国自身，又将如何影响世界？

在每一个国家的世界地图中，自身都位于地图的中央，这是对世界想象的开始，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而在真实的世界体系中，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大国的兴衰包含了复杂的历史逻辑，那些决定历史走向的潜流可以

说是早已发生。无论是用“大分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分岔，还是用上溯到“清明上河图”的方法来推测原始资本主义萌芽的“东洋的近世”，叙述的方法不同，决定了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谓“大分流”也好，还是“白银资本”也罢，其间争论的底色确有不同，但无论哪样的底色，都掩盖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认识是以古老停滞的帝国与西方世界的碰撞开始的。马格尔尼觐见乾隆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预告，一个只看到自己脚尖的叫魂式帝国的崩溃即将开始。当“天下”的幻觉猝然瓦解后，“世界”就呼啸着扑面而来。历史没有如果，那种假设没有西方的“切断”，中国就会平行于西方世界，独立从自身内部生长出一套市场基因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人们更应该反思，在千年的“无发展增长”中，中国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将如何去寻找失落的世界？

对于共和国 60 年历史的观察，脱离不了这些基本的历史框架。其实，无论是“现代”还是“中国”，这两个基本概念，都是在历史动态中生成。从近代历史来看，主义和问题的纠结，各种方案的竞争与试错，对于何为现代，何为中国的追问贯穿始终。这种追问随着 1949 年共和国建立，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答案。民族国家既立，国家建设的问题随之而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走在重新赶考的路上：建国一辈提出的对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的承诺如何兑现，如何才能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王朝周期率的试验重新开始。国家以强力意志推行追赶战略，初步建立了一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但后来，翻来覆去的运动也造成追寻现代中国道路的断裂。“超英赶美”的梦想不可谓不宏大，但是脱离现实和规律的路径选择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因此，从 1978 年开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追问再一次开始，封闭的大门重新打开，这个古老的 国家有着令世界震惊的意志来追求强大和幸福，曾经被压制的活力如野火般熊熊燃起，借着广阔的市场腹地、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和人口红利，中国经历了持续 30 年的高速增长，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这个“全球化的试验室”，不断刷新在全球 GDP 规模上的名次，更因为百年未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这个发生巨大漂移的全球体系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的说法，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也曾经历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长时间内如此强劲地增长，其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是改变世界的洋

流。而这种洋流的下一步流向，值得全世界的关注。从数据上来看，1950 年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1950 年全球支出不足 1 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为 13.8 亿人，而中国就占到了 40% 以上。1949 年人口死亡率为 20%。按照人类发展指数，中国的各种指数是最低的。而经过了这 60 年，中国的贫困人口迅速减少，各种发展指数已经大有长进，全球的增长地图都因为这些数字而改写。

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普遍的溶剂”，它既是一种长期的不可逆转的祛魅过程，又是从西方开始向全球推进的过程。有论者认为，以古老的中华帝国为中心，以“天下”为核心观念的朝贡体系可以称之为“第一次全球化”，而后来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是“第二次全球化”的代表，当今世界，则处于“第三次全球化”的语境当中。姑且不论这种分段法是否完全准确，但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这些年日益受到现实的挑战，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不仅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东方这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两分法面临质疑，而且那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单线进化模式，也不能对真实世界发生的故事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传统未必等于落后，现代未必等于先进，所谓现代也不能凭空从另外一个躯体跳出。即使对于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内部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概念。任何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要从农业化国家到工业化国家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都面临一系列的漩涡和逆流。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初期现代化时即陷入困境和动荡，而有的似乎即将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又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从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化随着全球化的卷入，有一个加速度的过程。据世界银行统计，英国在工业化初期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花费了 58 年（1780—1838 年），美国花了 47 年（1839—1883 年），日本花了 34 年（1885—1919 年）。而此后的巴西、韩国和中国则分别用了 18 年、11 年和 10 年。对于像英国那些内生的先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过程无疑是一个渐进的生长过程，现代化动力来自于社会内部，直到有一天发展的结果被人们称之为是“现代的”。而像中国、日本以及俄国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刺激都来源于西方的冲击。日本遭遇“黑船”威胁后，“脱亚入欧”，在全面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令人惊奇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俄国也是与欧洲文明的遭遇，开始了防御性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刺激反应性的模式，但是从洋

务运动开始一直到现在，严复那个关于现代化的著名比喻“变牛为马”论一直没有失效，而这是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内部紧张：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国家中脱胎换骨，又同时避免那些外来基因的排异反应。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实验室”，其间呈现出来的经验和教训，绝不是历史册页中薄脆发黄的一页，而是应该有着强烈现实意义的历史洞见。

对于一些观察家来说，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由一系列因素组成：政治上的稳定，基于财政分权的经济锦标赛模式以及渐进的变革方式。正是这些因素，中国道路既不同于亚洲价值模式，也不能被“华盛顿共识”所涵盖，甚至连“北京共识”也只是道出一二。这些归纳固然有自己的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就是一条完全跳出现代化国家转型史的抛物线。中国道路的形成，仍然包含着某种历史的暗线。那些基本的价值规范不仅在那些内生的现代化国家中早已体现，也同样为许多的后发现代化追赶型国家所证明。中国道路的特殊之处绝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从表面上看，改革开放采取的是一种和以往激进主义完全不同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但是这种渐进从内部来说，却代表了一种革命。而这种革命的最深刻之处，就是个体微观基础的巨大变化，是对公民与生俱来的一系列权利的逐步确认。这就像原来被当成封闭城墙上的砖体，或者一个庞大机器的螺丝钉，终于拥有了自身的选择和创造力。而这一点，不仅是千年来的“无发展增长”时代中无法做到的，也不是那个由所谓超级大脑所控制的计划经济所能完成的。这正回应了近代史开始时的天问：所谓船坚炮利只是表象，宪政法治方为根本。什么时候尊重公民追求幸福的正当权利，创造力就能勃发，社会就能得到充分发展；什么时候忽视甚至践踏这些基本权利，就会落入增长的陷阱，被 GDP 表面规模所迷惑，陷入治乱循环的历史悖论。

改革开放 30 年来，追寻现代中国的道路仍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从历史中别求新声，以人的自由来看待发展，变增长为发展，由国强而民富，不仅拥有强大的外在实力，也拥有柔韧的软实力，既能吸纳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一切全球文明之长，又能吐故纳新，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有着基本的认同和自觉，免于恐惧、饥饿和匮乏，享有公正、自由和尊严，而这将是中国道路对时代的贡献，也是中国故事生生不息的所在。

（本文作者：刘晖，《21 世纪经济报道》主编）

建国 60 年的中国经验，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

——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

独立自主道路与执政党的纠错机制

《21 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问）：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上升，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等多有讨论；在新中国 60 周年大庆到来之际，这些讨论更为频繁。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您认为中国这 60 年来走过的道路是否有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汪晖：中国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许多许多的预言——1989 年之后，不断地出现中国崩溃论，但就像台湾清华大学的于治中教授说的，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这些崩溃论崩溃了。人们因此开始总结为什么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获得了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有关肯定改革与否定改革的讨论，这个讨论也时时涉及如何估价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时期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国的成就是建立在这两个传统的地基之上的。与此同时，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提示中国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之中——无论是传统的计划模式，还是以 GDP 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主义模式。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中国 60 年来的经验。

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发展的稳定性，认为没有出现重大危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改革开放 30 年期间中国最大的危机是 1980 年代末的危机，中国度过了这场大的危机，但其后果至今在不同领域都可以找到印迹。这场危机同样是国际危机的一部分，不过这场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中国的危机可以视为苏东危机的前奏，不同的是，这些国家都倒掉了，而中国保持了基本体制的稳定性。像中国一样，这些国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它们一样倒掉？究竟是哪些要素维持了中国的稳定性并提供了高速增长的条件？在经历了 30 年改革之后，这些条件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异？要讲中国道路或中国的独特性等等，这是首先要

回答的一个问题。

苏东体系的瓦解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比如官僚体系与民众的对立,冷战政治中的专断政治,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民众生活状态等等。与之相比,中国体制的自我更新的意识要强得多,经历了“文革”时代的冲击,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需求有较强的回应能力,这些方面与苏东国家很不相同。但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及其来龙去脉,而只能集中于中国体制区别于苏东体系的第一个特征,即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主权地位。东德前共产党的最后一位总书记克伦茨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1989年后整个国家垮掉的原因,他提到了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联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苏东集团的内部变化。在冷战时代,西方的政治家经常用“勃列日涅夫定律”这个概念嘲笑东欧国家的“不完全性主权”状态。在华沙条约体系中,东欧国家没有完全的主权,受制于苏联的支配,苏联一旦出现问题,整个苏东体系都跟着垮掉了。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得以确立,但事实上在世界的范围内,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非常少,不仅是苏东国家,即便是西欧结盟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冷战的构造里,它们的主权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是不完全性主权国家。在冷战的构造里,两个阵营都是结盟性国家体系,每一阵营中的霸权国家发生变化或政策转变,其他国家都会深受影响。

伴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在建国初期,中国处于冷战两极构造中社会主义体系的一方,19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让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兵戎相见。在这个时期,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战后恢复和国际地位得到了苏联的巨大帮助,也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与苏联的某种程度的依附关系之中。但是,正如中国革命过程本身有其独特道路一样,中国在建设时期也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随后又与苏共展开公开论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逐渐摆脱了有些学者所说的与苏联的“宗主关系”,确立了自己社会主义体系、进而在整个世界中的独立地位。尽管台湾海峡仍然被分隔,但中国国家的政治性格是主权性的高度和独立自主的,在这一政治性格主导下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也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没有这一自主

性前提，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很难设想中国在1989年后的命运。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改革的前提。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自主性的改革，一个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改革，这与东欧和中亚的各式各样的、背景复杂的“颜色革命”截然不同。

其次，这个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是通过中共的实践来完成的，这是20世纪政治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过去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在理论上，又不完全是按照古典的阶级概念来谈论中国社会。过去最常用的人民这个概念，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都是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经犯过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共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通过与苏共的公开辩论，中国首先摆脱了两党之间的宗主关系，继而才摆脱了国家间的宗主关系，形成了新的独立性的模式。换句话说，这一主权根源是政治性的，是从政党关系中发展出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独立性在国家、经济等领域的显现。事实上，冷战时代的两极化构造的逐渐瓦解与中国对这一两极构造的持续批判和斗争有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于冷战的终结和世界和平，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由于中共与国家有一种独立的品格，因而也发展了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对改革的尝试，都曾出现各种偏差、问题甚至悲剧性的结果，但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中共与国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这些调整不是受制于外来的指点，而主要是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作为一种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重新思考改革以来的一些惯性说法，比如，就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现成的政策而言，“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说法当然是正确的，其实没有现成模式是整个中国革命的特点。《矛盾论》中就说过类似的话。没有模式的时候靠什么？靠的是理论辩论、政治斗争、社会实践。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但这一对实践的总结本身是理论性的，实践不可能没有前提和方向。这说明，那个时代中共探索自己的模式的时候，有着长期的斗争。

理论辩论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改革的理论源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就是从有关商品、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理论讨论中产生出来的，也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产生于 1950 年代，孙冶方和顾准发表了有关价值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论文，其大背景是中苏分裂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这个问题在 1970 年代中期再度成为党内辩论的中心课题。没有这样的理论辩论，也很难设想此后中国的改革会沿着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发展。到今天，有关发展道路的辩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局限于党内，但理论辩论对于政策路线的调整意义重大。如果没有体制内外发生的对单纯注重 GDP 增长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和抵抗，对新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探索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1990 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界的辩论部分地替代了以往党内路线辩论的功能，1990 年代末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2003 年后对医疗改革的反思，2005 年对国企改革和劳动权利的关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宣传和社会运动，等等，都对国家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影响。理论辩论在引导方向的问题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现在常讲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种纠错机制。政党由于缺乏党内的民主机制，在 20 世纪的历史上，党内路线辩论时时出现暴力和专断的特征，对此进行深入和长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对党内斗争的暴力化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理论辩论和路线辩论的否定，事实上后者正是摆脱独断、自我纠错的途径和机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提出了实践的绝对重要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理论性的，我们只有在理论辩论的意义上才能了解这一口号的意义。

农民的能动性与国家角色

问：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是否与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有一定关系？

汪晖：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这是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无论是在早期的革命和战争中，还是在社会建设和改革时代，农民表现出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最让人印象深刻。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在整个 20 世纪，乡村社会的动员、乡村社会组织的变化可谓天翻地